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19年7月19日

第4期



10 业界动态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在重图举行传拓技艺培训

11-12 镇馆之宝

重庆图书馆之古籍选介
杭州图书馆藏珍贵古籍

13 图书推荐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
反映战国文字考释的脉动

14 古籍史话

稀见史料中的程裔采

15 业界声音

姚伯岳：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路在何方

16 特别关注

张志清：怀念任继愈先生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重图举行传拓技艺培训

本报讯 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修复技艺专业委员会与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重庆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培训班近日举行。培训的主题是古籍传拓, 由从业60年的传拓大师赵嘉福先生的口传亲授。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秘书长王红蕾介绍, 这次古籍传拓技艺培训班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组织的第一场古籍修复专业培训, 也是联办单位重庆图书馆第一次面向社会举办修复技艺培训。

本次培训学员的特点, 一是

地域覆盖广, 学员来自北京、西藏、黑龙江、福建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二是行业跨度大, 以博物馆、高等院校最多, 少数来自公共图书馆等, 相当多部分是民间传拓爱好者。学历最高的学员在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但在修复方面并无经验。类似这样零基础或经验不足三年的年轻学员占了总数的近一半。

第一周以平面碑刻传拓为主, 穿插浅浮雕传拓, 夯实基本功。赵嘉福师承“碑刻圣手”黄怀觉, 碑刻、传拓、拓片装裱修复正

是他的拿手绝活。过去十年, 他作为重图古籍修复的指导专家, 将多张馆藏拓片复刻成碑。其中大部分石碑在此次培训中登场, 首次供外来人员传拓。第二周, 瓦当、砚台、图章边款、扇骨接连登场, 每天引入一个新项目, 新增一批教具, 让学员应接不暇,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学员以集齐拓片、制作精品为目标, 每天平均练习9小时以上, 共制作大小拓片667张, 最终以近百张拓片装点结业典礼的现场, 成为对本次培训最好的总结。



新闻速递

少数民族古籍珍品全国巡展走进呼和浩特

本报讯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不久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少数民族古籍专家学者, 共同品尝古籍文化盛宴。本次巡展展出了各少数民族珍贵古籍原件60余种、重要影古籍保护成果2000多册。巡展以图文展板形式介绍少数民族古籍书籍、铭刻、讲唱、文书, 蒙古汗国至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珍贵蒙古族古籍文献, 同时还展出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翻译取得的成就和古籍复制修复成果。

大陆古籍艺术类图书展在台北举行

本报讯 2019第十届大陆古籍艺术类图书展暨第二届线装书展不久前在台北举行。来自大陆的50多家出版机构带来逾6000种古籍艺术类图书及众多装帧高雅朴素的线装书。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会理事长沈荣裕说, 2010年岛内第一次举办大陆古籍艺术类图书展, 即广受台湾民众支持与喜爱, 成为台海内外同心向往的文化盛宴。上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光辉说, 此次大陆出版机构带来6000多种、2万多册各类图书, 感受到台湾读者对大陆出版图书的热情。该书展由台湾天龙书局与大陆九州出版社有限公司、上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少林寺公开晾晒珍藏古籍佛经

本报讯 不久前, 中国嵩山少林寺举行晒经法会, 公开展出平时珍藏于文物库房中的石经、纸经、木经板等诸多文物经卷, 也为游客提供了近距离感受佛教文化的机会。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 律学重镇, 历史地位较高, 早在北魏年间, 印度高僧就于少林寺设翻经台翻译经典, 《十地论经》《四分律经》都由少林高僧首译并传法, 加上近年来的收集整理, 收藏历代珍本佛经众多。此外, 还有许多儒家、道家珍贵典籍及艺术、医药类古书于少林寺藏经阁珍藏保护。

台胞陈成功向无锡市图书馆捐赠家谱资料

本报讯 无锡市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不久前收到一份来自台湾的邮件。邮件中包括他父亲1946年赴台周年照片原件及翻印件各1张, 台北市陈氏宗祠德星堂近照3张、陈氏德星堂资料1份。近几年, 他多次前来无锡市图书馆寻找无锡陈氏青祁陈大巷支的家谱, 试图找到其家族的血系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历史文献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终于在馆藏《陈氏家谱》(清光绪33年德星堂木活字本) 中找到了他祖先的信息。家谱中清楚记载了他曾祖父陈德昌、伯祖父陈永禄及祖父陈永祺的名字。此次陈成功先生捐赠的相关资料, 既丰富了无锡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及老照片的收藏, 也展现了谱牒文化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冷水江市图书馆举办《菜根谭》阅读分享交流会

本报讯 冷水江市图书馆不久前在多媒体演示厅举办《菜根谭》阅读分享交流会, 来自全市各单位的读书爱好者10余人参加了阅读分享。《菜根谭》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 距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它反映了明代知识分子佛、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著者糅合了儒家中庸之道、释家出世思想和道教无为思想, 结合自身体验, 形成一套出世入世的法则。在阅读分享交流会上, 大家畅所欲言, 对书中所喜爱的佳句相互交流了阅读体会, 认为《菜根谭》这本书对人的教益非同一般。

熊再华

重庆图书馆之古籍选介 多元采访 上乘珍品

馆长严文郁从“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办事处转赠书目中亲自挑选书籍, 入藏至重图前身罗斯福图书馆。其中有大量的古籍善本, 总数达605种、9873册。二是主动采购与收购。如1950年本馆更名为“国立西南人民图书馆”, 在时任馆长杨作平的带领下, 馆员们到成都、昆明、贵阳等地, 开展图书收购工作, 仅1951年就收购到古籍线装书6.7万余册。三是接受公私捐赠。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重庆著名实业家、藏书家、重图资深馆员的李文衡先生, 他将毕生私藏的4.4万余册图书全部捐赠给重图,

其中线装古籍3.7万余册, 包括南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元刻本《辽史》等数十部珍贵古籍。其他如鲜英、傅增湘、杨庶堪、梁漱溟等众多藏书家、学者、民主爱国人士, 都曾将自己珍藏的古籍捐赠重图。

重庆图书馆一贯重视对古籍的保护。2007年, 重庆图书馆新馆建成, 古籍也随之搬入新馆。按照国家标准, 加强了古籍书库的设施配备, 使书库的温度长年控制在16℃-22℃之间, 湿度控制在45%-60%之间。此外, 又专门购置了防虫的芸香草、樟木板对古籍进行防虫保护。对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的善本古籍, 重图更是专门量身定制了金丝楠木书盒进行单独存放。在安全措施方面, 古籍书库的防火、防水、防盗的设备设施齐全。

自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 重庆图书馆作为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 精心组织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 积极开展全市的古籍普查工作。历经十年, 终于完成本市古籍普查, 并陆续出版了包括《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在内的全市普查成果。随后, 重图又积极投身馆藏碑帖的普查, 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碑帖普查的公共图书馆, 获

得了图书馆界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肯定和好评。在此基础上, 重图还重视对珍贵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绉秋山馆行篋书目〉图录》《重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重庆图书馆藏中医古籍书目》《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从刊》《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重庆图书馆藏戏曲唱本普查目录及要目叙录》等大量成果, 广受各界好评, 使本馆珍贵古籍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 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供稿)

镇江市图书馆14部馆藏古籍 入选第四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

本报讯 江苏省政府不久前正式公布了第四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 镇江市图书馆所藏的14部珍本古籍顺利入选。

此次入选的14部古籍涵盖了多种版本形式, 其中稿本2种, 为《草湖笔记》《七政四余万年图》。刻本10种, 其中明代9种, 清代1种, 分别为: 明万历九年(1581)凌氏自刻本《汉书评林》, 明弘治十一年(1498)书林慎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 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熊氏一峰堂刻本《新刊性理大全》,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溪刻本《程氏演繁露》, 明末刻本《宋人百家小说》, 明刻本《唐宋白孔六帖》, 明崇祯十五年(1642)黄国琦刻本《册府元龟》, 明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后集》, 明崇祯五年(1632)罗万象等刻本《罗明德公文集》和清初宁远堂刻本《丽则集》。清代抄本2种, 分别为《夷齐志》《略识鸟兽昆虫草木名》。

其中, 《丽则集》是明清之际的一部文学总集。书中有清代文学家王士禛的亲笔批点和多枚藏书印, 极为珍贵。《草湖笔记》以日记形式纪录了清咸丰三年(1853)至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镇江等地的一些活动, 是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夷齐志》是一部关于伯夷、叔齐庙的志书, 据记载,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 浙江巡抚就曾向四库馆呈进过《夷齐志》。

图片报道



本报讯 由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主办, 麦积区图书馆承办的“传承地域文化, 展现家园风情”经典地方文献展不久前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代表麦积地方特色的文献284册(件), 包括地方史料、地方名人著作、地方出版物和伏羲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大地湾文化图书几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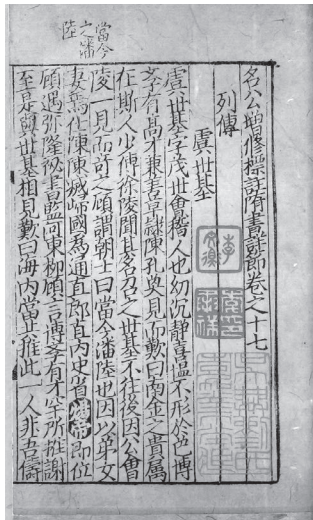
本报讯 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讲堂不久前在海棠书斋如期举办, 由青年国学者曹琳老师主讲《大学之道》, 吸引了30余名听众前来聆听。曹老师以《大学》开篇第一句“开宗明义”, 希望听众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修身、明德, 完善自我。

潍坊市图书馆 举办馆藏连环画 曝书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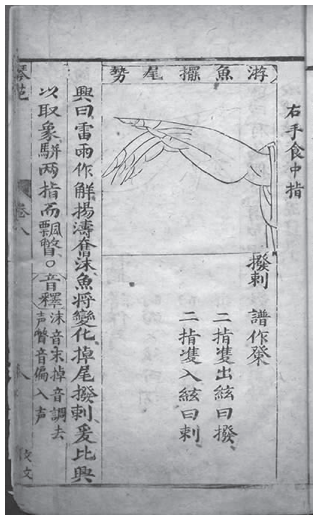
本报讯 潍坊市图书馆不久前举办了馆藏连环画曝书活动。曝书, 即定期把藏书拿出来翻晒。每年的伏天或初秋, 把书搬到室外晾晒, 以杀死书蠹, 是古代藏书除湿防霉、驱虫防蛀的传统方法。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说: “五月湿热, 蠹虫将生, 书经夏不展者, 必生虫也。……必须三度舒而展之。”

馆藏连环画是潍坊市图书馆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环画, 又称小人书, 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 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在娱乐生活相对贫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 连环画成为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 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广大“60后”“70初”少年难忘的阅读记忆。九十年代后, 因读者阅读喜好发生变化, 连环画逐步退出少儿读者阅读阵地, 成为特色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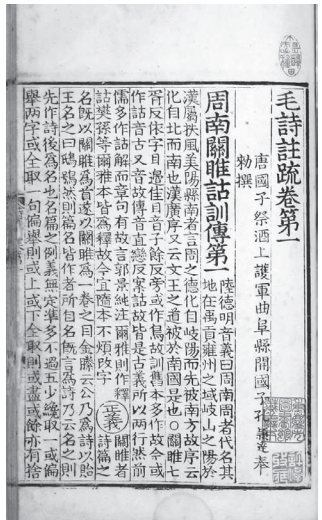
潍坊市图书馆举办连环画曝书活动, 旨在通过曝书、展示, 达到驱潮防虫、阅读欣赏等多重目的。



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



琴苑心传全编



毛诗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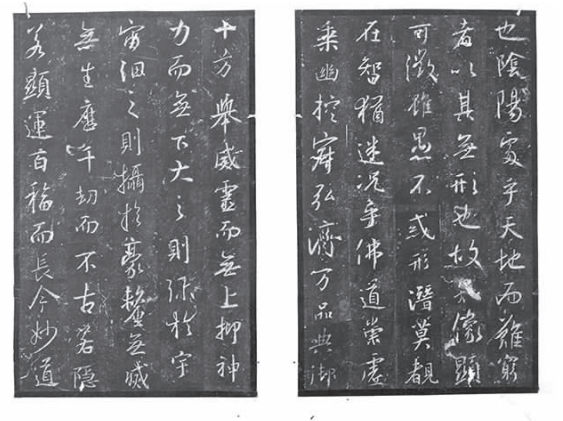
明季郡国利病书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



清代殿试卷



集王书三藏圣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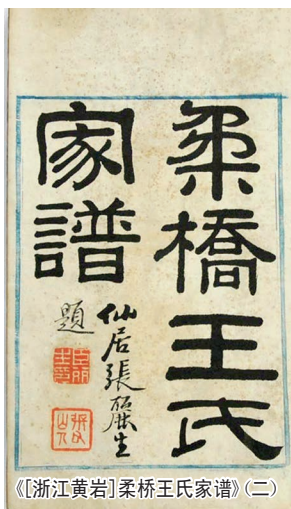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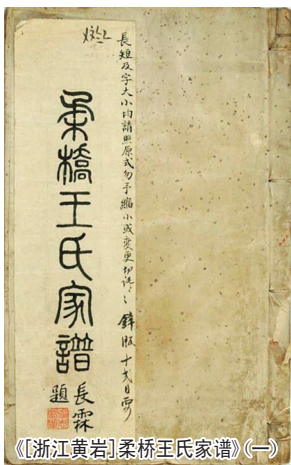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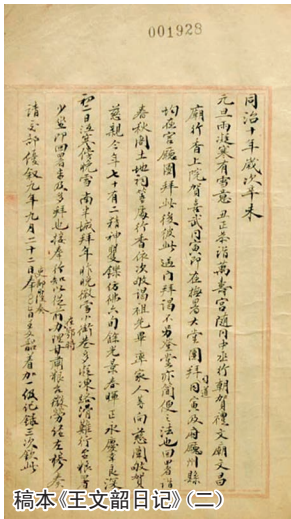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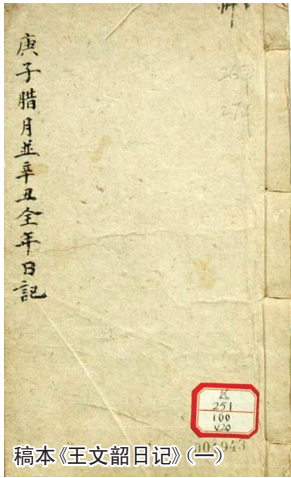
杭州图书馆藏珍贵古籍

种类颇丰 明清尤盛

□沈静（杭州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新馆座落于美丽的钱塘江畔,这里每天都吸引着大量市民前来自习和借阅各种图书报刊,保持着忙碌有序的节奏。在这幢洋溢着勃勃生机的大楼里,却有一处地方幽静而神秘。那里常年恒温恒湿,配有最先进的安保和消防措施,不用说普通读者,就是非专业的一般馆员也无缘一睹真容。这就是珍藏了杭州图书馆大量珍贵文献的古籍书库。本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杭州图书馆的珍贵古籍吧!

古籍书库共藏有古籍四万多册,其中善本六百余种,包括刻本、稿本、抄本和名家批校题跋本等。到目前为止,共有41部古籍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另有38部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在这些珍贵古籍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稿本《王文韶日记》。



古籍书库共藏有古籍四万多册,其中善本六百余种,包括刻本、稿本、抄本和名家批校题跋本等。到目前为止,共有41部古籍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另有38部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在这些珍贵古籍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稿本《王文韶日记》。

稿本《王文韶日记》等珍品

王文韶(1830—1908),字菱石,号退圃,浙江仁(今浙江杭州)人。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铨户部主事,以办事干练深得李鸿章、左宗棠器重。数年间,擢湖北按察使,升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光绪间王文韶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八年(1882),云南军需报销案发,他因受贿遭劾,遂乞回籍归养老母,旋丁母忧,前后家居六年。十四年,复任湖南巡抚,次年,擢升云贵总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文韶应诏入都,派充帮办北洋事务大臣。二十一年,调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曾疏陈筹办北洋海防,开办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兴筑京汉铁路,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等,以造就人才。二十四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军机处。戊戌变法时,受命办理矿务铁路总局。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他随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逃至西安,授体仁阁大学士,后充政务处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督办路矿大臣,转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乞休归,卒谥文勤。王文韶的一生正处于清末社会大变革之际,而他身为显宦,扬历中外,长期担任要职,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经历或参与了清末一系列重大事变,王文韶为人圆滑,善于趋避,有“琉璃球”“琉璃弹”之称。但他在日记中,却坦率地记录了对时事和人物的看法,日记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制度、人物等各个方面。他的日记不但是一生复杂经历的记载,一定程度上也是清末社会大变革的写照。其具体、丰富和真实之处,比一般的史传或回忆录有过之而不及,如“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条和“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详细记载了接待越南贡使的拜会及宴饯情况,“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条记载了户部三库的管理制度沿革,“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条记载了清廷对奏折制度的更改,“同治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条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条两次记录了陈宝箴的肯定评价等等。

这部日记稿本共二十一册,约八十万字,记事始于同治六年(186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历时达三十六年,除少部分阙失外,大部分保存完整。1989年,这部日记经整理校点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将此日记影印出版。

除了《王文韶日记》,杭州图书馆还藏有其他不少珍贵稿本,如《浙江黄岩柔桥王氏家谱》《武林风俗记》等。《浙江黄岩柔桥王氏家谱》是晚清著名学者王莱纂修的。王莱(1828—1899),字子庄,号耘轩,浙江黄岩柔桥村人。他在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无意仕进,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讲学、著述和修志事业上,历任黄岩九峰、临海正学、处州莲城、温州中等书院院长,先后编纂《九峰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县续志》等方志,著有《柔桥文钞》《台榭疑年录》《六书古训》《史记补正》《汉书补正》等著作。他的《柔桥文钞》总结一生学术思想,多受清末以来学者称赞。他所编的志书慎于校勘,繁简合宜,为清代方志的上乘之作,颇得梁启超等人推崇。在纂修家谱时,王莱也秉持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本族老谱所载的世系人物并不盲从,而是从世系人物的有无、关系、称谓、名爵、姻亲、年号等方面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证。这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修谱活动中是很罕见的,也使得这部家谱迥别于其他常见的宗谱、族谱,具

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武林风俗记》著者王同(1839—1903),字同伯,号肖兰,晚号吕庐老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主杭州诸书院。他擅长书法篆印,又娴熟掌故,著有《吕庐文集》《塘栖志》《杭州三书院纪略》等书。《武林风俗记》是王同未刊稿本中的一种。书中分为辑录和自著两部分,记录了一年之中不同月份杭州居民的各种习俗,是继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之后,研究杭州民情风俗的重要资料。

批校题跋本《红楼梦》

批校题跋本是杭州图书馆所藏古籍的另一特色。在馆藏诸多批校题跋本中,最为大众熟知的首推陈其泰批校题跋的《红楼梦》。《红楼梦》自问世之初就广受读者喜爱,如今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作者曹雪芹的显赫家世和曲折生平,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对这部小说的关注,以至出现“红学”一词。在乾隆时期,《红楼梦》主要以手抄的八十回本形式流传。这些抄本文字各异,误抄误改之处很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首次排印出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活字全本,卷首印有程伟元和高鹗的序文,后人称作“程甲本”。第二年,程、高二人修订书中讹缪,又用活字重新排印出版,此本又被称为“程乙本”。程甲本和程乙本是程伟元和高鹗利用相同的材料、前后两次整理而来的本子。据俞平伯校勘统计,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之处约有5900处之多。因此,就程本而言,程乙本显然是较好的后定本。然而,清代刊刻《红楼梦》多采用程甲本,致使程乙本反而流传不广。杭州图书馆所藏正是程乙本《红楼梦》。书中还附有陈其泰的批校题跋,共计两万有余字。陈其泰,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道光十九年(1939)举人。他一直热衷科考,但仕途不顺,只担任过云和训导、长兴教谕等微职。他的批校题跋写于道光、咸丰时,其中不少评语常被现代研究者引用。200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将此书影印出版。

杭州图书馆珍藏的其他批校题跋本亦为数不少,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金闾步月楼所刻《书经集传》,有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丁晏批校题跋;清康熙时刻《明诗综》,有乾嘉时著名藏书家吴骞跋;清汪氏自刻本《述学》,有晚清藏书家郑文焯题跋;清李文田抄本《说文部首歌》,有金石学家、藏书家吴士鉴题跋等。

明清时期的套印本、刻本

杭州图书馆还藏有不少套印本。分版分色的套印技术来源于最初的一版分色敷彩印法。到了明代,套印技术发展迅速,尤其以浙江乌程凌、闵两家为代表,除朱墨两色套印外,他们还掌握了三色套印的技法。如馆藏《李长吉歌诗》《周礼》为朱墨两色套印,苏洵批点的《孟子》则为朱墨蓝三色套印。清代以后,套印技术继续发展,馆藏《芥子园画传》已是五色套印了。

此外,杭州图书馆另有一些刻本也十分罕见,如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大定新编》,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存世仅两部,明弘治叶天爵刻嘉靖六年(1527)乔迁、余载仕重修本《豫章黄先生文集》仅存三部,明嘉靖刻《新编医学正传》仅存两部,明嘉靖四年(1525)姜思刻《焦氏易林》仅存两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丁永成刻《濂溪集》仅存一部,明万历刻武康四先生集本《沈兰轩集》仅存四部等。

总之,杭州图书馆所藏古籍总量虽不甚多,但其中有不少善本和珍品。只要符合图书馆古籍阅览规则,所有读者都可以愉快地阅读这些珍贵古籍,享受这份历史文化遗产。

一部战国文字的百科全书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反映战国文字考释的脉动

□陈伟武

曾经法(宪通)师和本人共同主编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下称《集释》),由中山大学老中青三代学人二十余人历经十五年辛勤耕耘始告完成,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借此机会,笔者将粗略勾勒战国文字发现和研究的**历史**,简述战国文字工具书编纂的成就,略谈对战国文字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点粗浅看法,并就《集释》的成书始末也稍作交代。

战国文字的发现

战国文字研究的历史,伴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而存在。如所周知,汉代已有战国写本的经典出土,最著者莫过于孔子壁中书的发现,这一发现曾被王国维誉为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发现之一。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往往是偶然的,汉初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教授堂来扩建自己的宫室,结果挖出了大量的古文经书,其中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

曾师指出:“关于孔子壁中书发现的年代,古籍记载有景帝年间和武帝年间二说,以情理推之,当是发现于景帝年间,而孔安国献书于武帝年间。”在汉代,儒家重要经典的战国写本还续有发现,如《论衡·正说篇》说:“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系统整理的汉代所见文字资料,固然有秦汉才出现的新俗字体,但主体仍是战国文字,小篆和籀文多属战国秦系文字,古文则大致为六国文字之遗留。许慎可说是对战国文字作过通盘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人。

《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级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当时参加汲冢竹书整理的学者有荀勗、束皙、和嶷等,得书十五部,八十七卷,四十余万言。可惜只有《穆天子传》等少量文献流传下来。

古代战国文字的两次大发现都对中国学术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指出,孔子壁中书属于齐系文字资料,汲冢竹书属于晋系文字资料,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现的多批竹简则几乎都是楚系文字资料。

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往往是个偶然造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屡有整理出土文献的“政府行为”,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如汉代官方安排孔安国整理中秘所藏孔壁图书;西晋时安排荀勗、束皙、和嶷等学者整理汲冢竹书。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沙滩红楼集中了一批全国一流专家从事秦简帛书整理,成果丰硕,堪称范例。

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时期

晚清学者陈介祺、程瑶田、吴大澂等已认识到许多古代兵器、玺印和陶器上的文字为晚周文字。而20世纪上半叶为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时期,何琳仪先生指出:

“近代战国文字研究,是建立在出土文字资料和对传世‘古文’研究基础上而兴起的新学科,王国维则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所言甚是。王氏确定了战国文字的性质,提出了“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重要学术观点,将东周文字分为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初步勾勒出战国文字分域

的规模。爬梳了兵、陶、玺、货等多种品种的战国文字材料,对多种传抄古文材料作了深入**的考察**。在当时疑古思潮盛行的时代氛围中有特殊的积极意义,李春桃先生已有专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及其考释成果屈指可数,如20年代洛阳金村出土的鬲羌钟,有吴其昌、徐中舒、刘节、温廷敬等学者分别撰文考释;30年代安徽寿县楚墓出土的铜器群的考释;唐兰先生、张政娘先生考释齐陶文的论文;石鼓文和诅楚文的一些相关论文等。40年代长沙楚帛书出土;50年代几批楚简的零星发现,只有饶宗颐、朱德熙、史树青等几位先生的论著作专门研讨。总体来说,战国文字研究的进展较为缓慢。直到李学勤先生《战国图铭概说》的发表,才标志着战国文字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战国文字研究的勃兴时期

七八十年代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勃兴时期。这一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如中山王墓铜器、睡虎地秦简、曾侯乙墓钟磬和竹简、包山楚简等,都引起了一阵阵的研究热潮,何琳仪先生、李守奎先生分别作了很好的归纳,此处可略为补充。这一阶段国内三个学科点曾对战国文字有集中的研究,如北京大学朱德熙、高明、裘锡圭、李家浩、李零等先生的楚简整理,楚帛书、货币文、古玺文、古陶文研究;吉林大学于省吾、姚孝遂、林沄、何琳仪、吴振武、汤余惠、黄锡金、曹锦炎和刘剑等先生在战国文字理论建设、分类考释、传抄古文等方面的研究;中山大学容庚、商承祚、马国权、曾宪通、陈炜湛、张振林、孙稚维等先生对战国金文、楚简、楚帛书、古玺文、古陶文、睡虎地秦简和传抄古文的整理与研究。90年代以来的战国文字研究延续了兴旺的态势,包山简和郭店简的先后公布,震惊了海内外汉学界,而正在陆续整理刊布的上博简、清华简和即将刊布的安大简,相关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喜人。

文字考释是古文字学的核心。晚清以来,战国文字考释的成果汗牛充栋。许多成果让人津津乐道。朱德熙先生释“者”、释“廌”,裘锡圭先生释“市”、曾师释“露”,吴振武先生释“廌”、释“鍾”等等,无不脍炙人口。

汉语文字学中字词关系的研究,裘锡圭先生有开创之功,黄德宽、李运富、陈斯鹏、田炜等学者各有贡献,近年这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并不局限于战国文字研究这一分方向,但主要还是得力于战国文字研究的成果。

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结合研究,如黄盛璋、何琳仪、黄锡金、陈伟、徐少华、吴良宝等将战国文字考释与历史地理学研究相结合。重视名物的研究,与出土文物相结合,如刘国胜对楚简中丧葬

简的研究,萧圣中对楚简中车马器名的研究,范常喜对楚简中战国音乐史料及其他名物词的整理与研究。这应是未来大有可为的领域。又如孟蓬生、陈伟武、王志平等将战国文字考释与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考察、文本内容的串讲或翻译诸方面,较少字词考释方面的篇章。本书中只能适度裁择,无法兼收并蓄。

反映百余年来战国文字考释的脉动,让学术界在治古文字学史时有所取资。这也是此书的目的之一。回首战国文字研究的历史,有几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重大发现带来学科发展的契机。新发现带来新学问,如20年代洛阳金村出土的三晋青铜器群,30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铜器群,70年代中山国、曾国、秦国的大宗文字资料出土,都引起了一阵阵的热潮,刺激了战国文字研究的迅速开展,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如中山王墓文字资料的考释,提升了人们对传抄古文价值的科学认识。

其二,重要学术人物对学科发展贡献卓著,如王国维、容庚、于省吾、商承祚、李学勤、裘锡圭、曾宪通等。

其三,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过去墨拓技术对古文资料**的传布**有重要的作用,黑白摄影技术、彩色摄影技术、红外扫描摄影技术都先后对战国文字研究贡献良多。我们正身处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科学技术为研究工作带来莫大的便利,未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一定发展更加迅猛。

战国文字工具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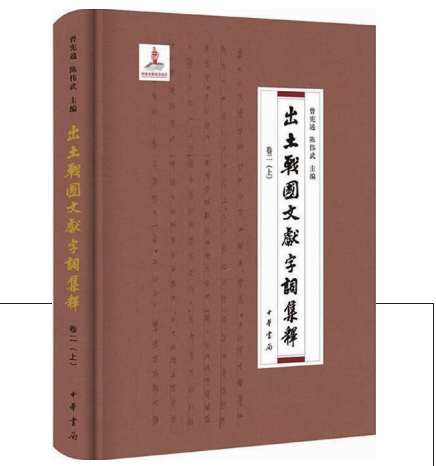
1928年丁福保《说文解字沽林》出版,这种网罗众说、洞见结症的著作对学界帮助至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孝定先生独力撰集的《甲骨文字集释》,周法高先生主编的《金文沽林》《金文沽林补》;90年代于省吾先生主编、姚孝遂先生按语撰写的《甲骨文字沽林》,李圃先生主编的《古文字沽林》,黄德宽先生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都是古文字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目前见到的战国文字工具书主要有: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998);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2008),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典》(2008),刘信芳《楚简帛通假字释》(2011),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2012)、《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2017);徐在国《楚帛书沽林》(2010);滕壬

生《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2008),汤余惠

一部战国文字的百科全书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反映战国文字考释的脉动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全十七册)
作者:曾宪通、陈伟武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9年2月
定价:4800.00元
内容简介:本书为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书稿对出土战国文献中所见近8000个字、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集释,囊括了陶文、玺文、金文、货币文、玉石文、简帛文等门类资料。全书共16卷(含索引卷),共十八册,以字系词,以词带句,在各字头之下先罗列代表字形,标明字形出处,后略依时代先后集录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标明文献出处,以方便读者查考。对一些错误以编者注的形式指出,并适当施加按语,对利用出土战国文献提供了很多方便。

主编《战国文字编》(2001/2015),李守奎《楚文字编》(2003),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2006),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2007),徐在国《战国文字论著目录索引》(2007),孙刚《齐文字编》(2010),饶宗颐主编、徐在国副主编《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2012),李守奎、贾连翔、马楠编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编》(2012),王辉主编《秦文字编》(2012),方勇《秦简牍文字编》(2012),徐在国《上博楚简文字声系(一~八)》(2013),汤志彪《三晋文字编》(2013),朱晓莹《包山楚简综述》(2013,引者按,内含文字编),张振谦《齐鲁文字编》(2014),李学勤主编,沈建华、贾连翔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文字编》(2014),《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陆)文字编》(2017),徐在国、程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形表》(2017);等等。

战国文字研究及相关工具书编纂方面已硕果累累,以上诸书取材各有所重,类型与功用大多较为专一,希望《集释》在某种程度上能弥补上述工具书的遗憾,努力从总体上反映战国文字考释的历史面貌和现状。学如积薪,假若没有前述多种工具书的重大贡献作为基础,《集释》之成亦不可思议。

(本文为《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前言,标题为编者拟,内容有删减)

怀念任继愈先生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

任继愈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22年,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在21世纪,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模式将有根本性变化,必须有前瞻性的规划。他非常关注刚兴起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詹福瑞馆长曾说,任先生所倡导的观念,反映在当时馆内确立的‘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战略中。他整理文献,培养人才,以身作则,以文化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学者本色,哲人智慧,仁者风范,深深感染了全馆员工。任先生在国图馆长任上,领导了大规模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作为学者,任先生把生命化作一部部著作,他的大弟子李申先生有段话特别能反映任先生整理中华传统典籍的意义。他说,任先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而应该是活着的文化。但是需要清理,才能让这份遗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

”

2019年7月11日,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周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列为“四个自信”的组成部分。古籍的保护修复、整理研究、数字化和出版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先生所盼望的“第四次文化大繁荣”正向我们走来。

任先生是中国卓越的哲学家、教育家和人文学者,是新中国宗教事业的奠基人。他创办的世界宗教所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齐全。他组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老子绎读》影响深远。他多年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任先生生前提出的诸多文化论断,如有关儒家和宗教关系的论断、对儒释道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体系的论断等,关系着当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关系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他在整理中华文化典籍上的卓越贡献和开创的不朽事业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发扬光大。

我对任继愈先生建立的敬仰之情,源于在大学期间读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老子新义》,特别是《老子新义》,简单易懂,非常亲切,成为我背诵的底本。初识任先生是在文津街分馆。八十年代末《中华大藏经》编译局设在文津楼地下室,很多老先生在这里编纂《中华大藏经》。任先生经常去看望各位先生。为了给大家解决午休问题,任先生建议买了一些竹制躺椅,让各位先生能够睡午觉。任先生主动向我们这些年轻馆员询问业务和生活情况。他说大家守着这么多古籍,可以沉下心来多读书、多整理文献。

我最大的荣幸是与任先生同属善本特藏部党支部,一起过组织生活。每次支部大会先生必到场,他的发言不多,但每有哲人之思,给党员们很大的激励。他主张开设“文津讲坛”,亲自介绍专家学者来馆讲授传统文化,还经常在周六日来馆,坐在下面听各位先生讲演。他非常尊重老先生,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出版,任先生特别写下“仁者多寿”题词,祝福年近期颐的张秀民先生。善本部倡导民众捐资修复敦煌文献,任先生亲自给捐款者发放证书,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事业。先生参加的善本部活动数不胜数,每每给我们支持鼓励,让大家非常感动!

2007年,任先生与方广钊先生到善本部办公室与大家座谈。他说有一个理想,就是想把国图藏的敦煌遗书全部影印出版,供学界研究。他希望能够看到馆藏敦煌遗书全部出版的那一天。任先生挨个与每个人照相,大家纷纷表示要全力完成这项任务。馆藏敦煌遗书的劫余部分,过去曾经收录到《敦煌宝藏》中,这次要顺利出版发行,就必须降低成本和定价。在当时没有额外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善本部征得馆领导同意,免收出版社全部底本费用,把一册书的定价降到900元以下。国图出版社郭又陵社长和徐蜀总编大力支持,用彩色缩微胶卷(一种小型反转片)拍照,以提高精度质量,丰富影印层次。善本部组织人力负责提书、修复、前整理、监护、后整理、归库等,工作十分辛苦,甚至有刚到善本部工作的博士生在监护拍照时因受不

了长时间炽热灯光照射晕过去的情况。方广钊和李际宁、黄霞等专家也是夜以继日,勉力编辑。任先生看到大家这样工作,专门写信给财政部,要了两百万补贴,资助编纂出版。这部饱含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在任先生过世后三年内全部出版齐全,受到业界的高度赞扬。

任继愈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22年,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在21世纪,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模式将有根本性变化,必须有前瞻性的规划。他非常关注刚兴起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詹福瑞馆长曾说,任先生所倡导的观念,反映在当时馆内确立的“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战略中。他整理文献,培养人才,以身作则,以文化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学者本色,哲人智慧,仁者风范,深深感染了全馆员工。

任先生在国图馆长任上,领导了大规模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作为学者,任先生把生命化作一部部著作,他的大弟子李申先生有段话特别能反映任先生整理中华传统典籍的意义。他说,任先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而应该是活着的文化。但是需要清理,才能让这份遗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他晚年要做的三部大书:一部是《中华大藏经》,一部是《中华大典》,一部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其间还有数不清的中小型古籍文化丛书。李申先生说:“越来越多的古籍以各种形式被整理出版。在清理传统遗产工作中,先生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家,到佛教,到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领域,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任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自觉担当起历史使命的人。

古之君子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说法,任继愈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君子、一位仁者。是我们永远怀念的老馆长。每当任先生忌日,都有敬仰先生的馆员去扫墓献花。今年是任先生逝世十周年,7月10日上午,国图青年人已经去给任先生扫墓。7月12日下午,国图举办了馆内的纪念座谈会,寄托大家的怀念之情。任先生在国图是不会被忘记的。

任先生出版《老子绎读》后,签名送给我一本未裁的毛装本,成为我最珍视的礼物。任先生过世后,我曾写了文章《学者本色,文化传灯——怀念任继愈先生》寄托哀思。我不是任先生的弟子,但以先生为引路明灯,愿意把职业生涯都献给祖国古籍保护事业,为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服务。现在,任先生倡导建立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顺利。每年国图都开发大量的珍贵文献典籍。近三年来,全国图书馆联合公益发布的古籍资源达到7万种,相当于20部《四库全书》的规模。这曾是任先生在国图开创的事业,相对于文化这个广阔天地,我们只是在一个小领域奋斗,仍然感到意义重大、其乐无穷。

任继愈先生永远活在国图人心里!

(经作者同意,从国图微信公众平台上转载)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主要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代表作品

